



● 赵晓兰 著

宋人雅词原论



巴蜀书社



● 赵晓兰 著

宋人雅词原论

巴蜀书社 ·

中国 · 成都

策划组稿 何 锐
责任编辑 何 锐
封面设计 李文金

宋人雅词原论

赵晓兰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 (028) 6656816 发行科电话 (028) 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印刷
成都市二仙桥东三段5号 (028) 412325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50 千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7-80523-996-7/I·418 定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从“尊道”到“从势”	[1]
关于老子的人格境界	[16]
庄子的心灵境界	[26]
屈原与浊世	[58]
荀子雅俗观略论	[76]
王充《论衡》讥俗略说	[91]
魏晋士人与雅俗之辨	[104]
北宋党争与宋人的雅俗之别	[150]
抒情角度与温庭筠和柳永的词境	[173]
柳永与宋词的雅化	[189]
论张先词的雅化	[201]
潘阆·苏轼·观潮诗词	[216]
苏轼《江城子》(记梦)评议	[225]
以诗为词:论苏轼词的雅化	[235]
以诗为词:论贺铸词的雅化	[254]
以诗为词:论宋词的题序	[268]
宋人词选略论	[284]
宋人词论的核心——词的雅化理论	[313]

四库馆臣与词	[349]
后 记	[364]

从“尊道”到“从势”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动荡的时期，也是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随着社会由宗法贵族制向官僚地主制过渡，封建秩序逐渐解体。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分化改组，导致了士阶层的出现。以孔子为先导、为代表的士阶层，以道自任，是“士阶级表现其群体自觉之第一次”（余英时《汉晋之际之新自觉与新思潮》）。随着历史背景的变化，道与势的关系由“道尊于势”转变为“重势轻道”或“枉道从势”，士因而失去了以道自负的精神制高点。其时之士人，或审时度势，或枉道从势，或高蹈遗世。由于士阶层的“群体自觉”，士之精英对社会现实及自身所属之士阶层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反思，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道家学派愤世嫉俗，他们超越俗世俗权，逍遥自适，追求个体精神的独立与自由。这样的历史性格，主要受“历史条件中的政治条件”影响而来，它是两汉以后特别是魏晋六朝、两宋士阶层绝俗尚雅、严于雅俗之别的精神源头。

—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被孔子称为“无道”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

是其经济、政治的下移及其学术的民众化，“士”便是其时社会变迁的产物之一。

据现存文献，古制有所谓“井田制”，有公田、私田之分。春秋以后，国君与豪族及豪族之间对土地的争夺日益激烈，井田制逐渐崩溃，私田越来越多，形成“私门富于公室”的局面，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目的正为削弱私门炙手可热的势力。

“私门富于公室”的土地占有形式的形成，导致了旧的经济基础的衰微及瓦解，原有的政治制度也渐趋没落，“以贵治贱”的“春秋之义”（《谷梁传》隐四年）日益倾颓，这是一个弱肉强食、以实力取胜的时代，一个“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文武之道尽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的时代。

除了王室、诸侯势力的消长，社会各阶层也处于急剧的动荡与变化中，由于贵族的衰落和平民地位的上升，贵族与平民间的界限渐渐模糊。“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社会地位的上升，即为其时社会阶级动荡变化的一个例证。

在社会阶级的急剧变化中，原先为“低级贵族”的“士”成为“四民”即“士农工商”之首，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士。这个新兴的社会阶层的代表，便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冯友兰先生说：“（孔子）以前所谓士，多系大夫士之士，或系男子军士之称，非后世所谓士农工商之士也。”又说：“孔子以前，不仕而又别不事生产者，实未闻有人”、“孔子之前，未闻有不农不工不商不仕，而只以讲学为职业，因以谋生活之人。”（《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这种“不仕而又别不事生产者”，便是新兴的士阶层。

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学术官守”，官师不分。其时人们每以君师并称，国之辅宰重臣往往又是帝王之师。孔子以前，书亦在官府。“古者政教不分，书在官府，欲得诵习，颇非易易。故韩宣子，晋世卿也，必俟至鲁观书见太史氏，始得见《易象》与《鲁春秋》（《左传》昭二年）。季札，吴公子也，亦必俟至鲁，始得闻各国之诗与乐（《左传》襄二十九年）。一般平民，更无论焉。大凡典籍深藏官府，则有承传，无发展；谨世守，无研究。”（罗根泽《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在“学在官府”、“书在官府”的社会体制下，书籍、知识、学术均为官府、贵族垄断，所谓“舍官府外无学问”，这与政治上的“世禄世卿”制度是相通的。

春秋中叶后，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巨变，官学亦逐渐没落，天子失官，学在四夷，“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其时“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私人讲学之风，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兴起的。

孔子身后，其弟子“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汉书·儒林传》）。他的一些弟子如子张、子游等亦教授门徒，后来形成“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的鼎盛局面，这对士阶层的形成产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相传墨子曾为儒门弟子，后因对其学说不满而另创学派。《淮南子·要略》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说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也曾开设私学，其弟子与墨子一样，“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尚贤贵义。墨家学派与儒家互相诘难，分庭抗礼，同被称为战国时代的显学。

孔子不但开私人讲学之风，又开游说干君之风。“他继续不断地游说干君，带领学生，各处招摇。此等举动，前亦未闻，而以后则成为风气，此风气亦孔子开之”（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

由于鲁国政不修，曾任鲁大司寇行摄相事的孔子终于离职远行。从五十六岁起，孔子率领弟子，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游说干君生活。司马迁称其“干七十君”，今史籍有载者则有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十数国之多。

继孔子之后，墨子亦曾率弟子游说列国，他“自苦而为义”，经历了艰苦的游说生活。墨子游说的原则是“必择务而从事”，即根据游说之国的不同国情，或语之尚贤、尚同，或语之节用、节葬，或语之非乐、非命，或语之尊天、事鬼，或语之兼爱、非攻。这些说君的内容，构成了墨子学说的基本观点。也可以说，墨子的学说本来是为干君而用的。为了“行义”，墨子率徒周游列国，他是孔子之后又一位游说干君的大师。他们的游说干君，对其后士成为“无定主”的社会阶层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孔子和墨子从事私人讲学，游说干君，他们的学说有诸多对立之处，但他们均具有一种“士”的角色定位的自觉，即他们都明确意识到，“士”作为以道自任、自重者，可以不治生产，以讲学、干君谋取生计。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坦承：“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以“请学稼”、“请学为圃”的樊须为“小人”，孔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墨子南游时载书颇多，其弟子怪而问之，墨子曰：“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

吾安敢废此？”（《墨子·贵义》）墨子曾与鲁人吴虑辩论，认为吴虑从事生产劳动，不如“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墨子曰：“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鲁问》）墨子的观点是，研究先王的学说，通晓圣人的言辞，用以说大人，如获采纳，便可治国安民。因此，即使不亲自劳作，因“教天下以义”，功劳远比埋头耕织要大。

孟子对于“士”担负的社会角色有更清楚的表述：“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尽心上》）孟子又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孟子还称：“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滕文公下》）从孟子“守先王之道”、“为仁义者”之说，足见孟子确是以道自任、自重的。以道自任的劳心者治人、食于人，在孟子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孟子的治人、治于人之说，或不无可议之处，但确也可见出其时士已承担了明确的社会分工，成了独立的社会阶层。

二

在政局变幻莫测、动荡不安的春秋战国时期，统一是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政治课题。孟子见梁襄王，襄王问曰：“天下恶乎定？”孟子对曰：“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可见天下一统

确是当时各国君臣关注的焦点。在统一大业上，士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士的韬略、纵横捭阖往往成为国家成败盛衰的关键，所谓“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孔丛子》卷二）。孔子和墨子都希望推行贤人政治，《墨子》有《尚贤》篇、《亲士》篇，认为“归国宝，不如献贤而进士”、“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亲士》），孟子、荀子也力主尊贤使能。其时各国纷纷延揽人才，礼贤下士、用士养士成为时代的风尚。战国君主中，魏文侯及鲁缪公以礼贤著称，人臣则以进贤为最宝贵的品格。“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战国策·秦策》），贤人如此重要，以至有“万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亡”（《战国策·楚策》）之说。道尊于势的观念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礼贤下士、用士养士，目的是得士，齐桓公用管仲为相，养游士八十人，战国四公子亦皆养士数千人。但这里的“士”，常常又被称作“食客”，即仰仗君主或名门贵胄之豢养为生。孟子曾描述过子思受养的境况：

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台无馈也。……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廩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已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孟子·万章下》）

子思称缪公“亟馈鼎肉”为“犬马畜伋”，不愿为食肉而屡屡磕头作揖，感恩戴德，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养士的实质及士人对受养的感受。士“在社会上无物质生活的根基；除政治外，亦无自由活动的天地。在战国时代所出现的‘游士’、‘养士’两个名词，正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性。‘游’是证明它在社会

上没有根；‘养’是证明它只有当食客才是生存之道。而游的圈子也只限于政治，养的圈子也只限于政治。“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开始便是政治的寄生虫，便是统治集团的乞丐。所以历史条件中的政治条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性格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士的历史性格，确是由“历史条件中的政治条件”决定的。

士的历史性格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士阶层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孔子又曾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孔子对自己的政治才能充满信心，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孟子则以平治天下为己任，且以伊尹为例，论析士当以先知先觉自命。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上》）孟子亦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上》）

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知先觉，以道自任自重。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种以道自任的精神在《孟子》中亦随处可见，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孟子还把是否知“道”作为划分君子与“众”的标准，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

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尽心上》）这种对“君子”与“众”的划分，充分体现出孟子作为先知先觉，其强烈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士之历史性格还表现在对“道”与“势”关系的认识、处理上。这里的“道”，指“道不同不相为谋”、“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之“道”，即事理、真理；“势”指“古之君王好善而忘势”（《孟子·尽心上》）、“天子者势位至尊”（《荀子·正论》）之“势”，即政治权力。在“天下无道也久矣”的春秋战国时期，“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这个以天下为己任，且继承了尧、舜、文、武等先王贤君道统的士阶层，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对统治者手中握有的权势具居高临下之态。以道自任的士阶层认为，势依于道，即统治者的地位、权势必须以道及任道之士为依托，当权者有求于道，故形成因势求道的政治格局。

持道而议的士认为，国之存亡以是否行仁政为关键，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孟子·离娄上》）由于国家的废兴存亡、统治者的地位权势均取决于国之“有道”或“无道”，故“道尊于势”的观念便成了无所依傍、以道自重的士阶层的精神制高点。

士是三代以来道统的承传者，而得道与否是事关成败兴亡的头等大事；要实现一匡天下的宏愿，具“王天下”勃勃雄心的当权者不得不对道、对持道之士有所希求。道尊于势，君臣以义合，士需事君以道。孔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

止。”（《论语·先进》）其时墨子被尊为北方之圣人，不时举荐其弟子为官，但为官之弟子必须奉行墨家学说，否则就辞官而去。墨子曰：“天下无道，仁士不处厚焉。”（《墨子·耕柱》）孟子对道、势关系的论析尤其深入，措辞也十分激烈。孟子曰：“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以有为也。”（《孟子·公孙丑下》）

关于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孟子还有进一步的论析。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士用以自任的“道”至高无上，不能以之屈从于诸侯。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尽心上》）孟子将屈道从势称为“妾妇之道”，与“妾妇之道”相对的，则是独行其道的大丈夫。孟子曰：“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凭着浩然正气，孟子“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下》）孟子所言，展现了以道自任的士对政治权势的居高临下的态度。

恃道自高的士甚至不屑为帝王之臣或帝王之友，必欲为王者师。燕昭王尝往见郭隗求教，郭隗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战国策·燕策一》）相传孟子

之师子思即不愿与君王为友，孟子曰：“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万章下》）宰我认为孔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称“自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之弟子亦对其极尽称颂之能事，称荀子“德若尧舜，世少知之。方术不用，为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为纪纲。呜呼贤哉，宜为帝王”（《荀子·尧问》）。足见战国士人对道之尊崇及道高于君的价值取向。

士的历史性格又体现在士对修身的高度关注上。余英时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恃的“道”是人间的性格，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自始即面对着巨大的政治权势。他们虽自任以“道”，但这个“道”却是无形的。除了他们个人的人格之外，“道”没有其它保证。士之所以自任者极大，而客观的凭借又极薄弱。因而，要肯定他们对“道”的信持，只有通过精神修养即修身作为可靠的保证。儒家的修身便是在这种情势下成为士阶层实现理想人格的根本途径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

修身是士阶层的道德自觉，仁则是儒家学派思想的核心。孔子认为“人人有贵于己者”、“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不远人，它的基本内涵是爱人，对内注重内省，对外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亲密关系。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 这种“为仁由己”的修养便是修身,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 只要能通过修身实现修己“正其身”, “于从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子路》), 可见理想人格是以道自任者从政的凭借。对道、势关系持激烈态度的孟子, 对修身也非常重视。孟子将修身与平定天下相提并论, 曰: “君子之守, 修其身而天下平。”(《尽心下》) 又曰: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 这样的内省、修身的工夫, 这样的人格理想, 确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士阶层所能找到的任道的最坚实可靠的保证, 尽管它在强大的权势面前显得十分脆弱。

三

士阶层是战国时期社会分化的产物, 这个阶层从产生之时起, 自身也开始分化。随着“道”与“势”力量对比的变化消长, “从道”还是“从势”的矛盾几乎无所不在, 成为士阶层无法回避的尖锐现实问题。其后大一统的巨大政治权力更使士阶层以之自任的“道”相形见绌, 守道之士已渐难觅, 枉道以从势者却比比皆是, 这是一个从“尊道”向“从势”的巨大转变。

孔子是最早崛起的士阶层的成员, 然而, 恪守忠恕之道的孔子, 以其敏锐的感受力, 从士诞生之时起, 便已为之深感忧虑。孔子曰: “德之不修, 学之不讲, 闻义不能徙, 不善不能改, 是吾忧也。”(《述而》) 又曰: “古之学者为己, 今之学者为人”(《宪问》), “女为君子儒, 无为小人儒”(《雍也》)。孟子主性善,

但以其锐利的眼光，孟子也察觉到道与势力量的消长及士阶层的迅速分化。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尽心上》）又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荀子更据其“明分使群”的社会观，将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层次：“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恣士者，有小人者。”（《不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儒效》）在势的巨大威压下，士的人格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形或萎缩。

由于历史背景的改观，道与势的力量对比不断变化，士阶层立身处世的态度也随之改变，从以道自重、道尊于势到重势轻道再到枉道从势、依势论道。应该说，这种变化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士人恃道自高、道尊于势的历史条件是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纷争，图谋一匡天下。当此历史背景发生变化时，“道”作为精神权威的基础已不复存在。而权势的巨大威压，富贵利禄的巨大诱惑，使得一些丧失良知、道义的士人摒弃士阶层最基本的价值标准，枉道从势，仗势弄权，谄君从俗，谋取私利。其余面临严峻现实抉择的士人也不得不审时度势，或以策侍君，或邀宠固位，导致士阶层人格的全面萎缩。

《战国策·秦策一》载有苏秦以连横说秦王之事，意味深长。苏秦引锥刺股，发奋苦学，为“说当世之君”，“取卿相之尊”，其功利目的显而易见。苏秦始将连横说秦王，后则以合纵说六国